

本庫

# 论张橫渠哲学思想

冯正刚著

240295

13,404  
F2G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b>一、张横渠哲学体系的结构及性质</b> .....	(4)
1. 张横渠构造思想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紧紧地抓住了本体论问题和人性论问题.....	(4)
2. 张横渠紧紧地抓住本体论和人性论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原因.....	(9)
3. 张横渠关于本体论和人性论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论述.....	(19)
4. 张横渠怎样围绕本体论和人性论问题把认识论、伦理观等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32)
<b>二、张横渠哲学为什么受到程朱理学及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推崇”</b> .....	(47)
1. 关于程朱理学对张横渠的“推崇” .....	(50)
2. 关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张横渠的“推崇” ..	(71)
<b>三、张横渠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b> .....	(84)

张横渠原名张载，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人，因讲学横渠镇，故当时人们以及后来的历史资料都以张横渠相称。他生于一〇二〇年（宋仁宗天禧四年），死于一〇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现存《张子全书》及《张子语录》是研究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材料，其中尤以他晚年嘱门人编纂的《正蒙》一书最为重要，是他“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诸六经”的“历年致思所得”，是他的晚年定论。

关于张横渠哲学，学术界对许多问题存在着分歧的意见。比如其哲学性质，有认为是二元论的，有认为是唯心论的，有认为是唯物论的，也有认为初为唯心论，后转为唯物论。众说纷云，认识很不一致。再比如其“德性之知”的性质，其神化理论的目的，其《西铭》与《正蒙》的关系，等等问

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又比如，与上述一系列问题相联的，对张横渠哲学为什么受到唯心主义者及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推崇”；张横渠哲学是不是宋明道学的一个过渡环节；张横渠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应该如何估价，所有这些问题，认识都很不一致，都值得深入地探讨。

关于张横渠哲学思想评价的分歧，有的是由于对原始材料的理解不同而带来的；有的是由于张横渠哲学体系中某些矛盾现象而带来的；有的是由于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复杂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而带来的；也有的是由于分析哲学思想的方法论不同而带来的。本文拟就下面三个问题谈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 (一) 张横渠哲学体系的结构及性质；
- (二) 张横渠哲学为什么受到程朱理学及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推崇”；
- (三) 张横渠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考察理论本身，第二部分主要是从张横渠哲学与其他哲学派别的历史联系中来考察其哲学性质，第三部分是想通过上述两方

面的考察，对张横渠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一个科学的评价。文章结构的这种安排，一方面是针对学术界关于张横渠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是想使我们的分析，按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剖析马赫主义的方法论来进行。列宁在写完书的前三章，在第四章一开始就说：

“在此以前，我们曾经单独地考察了经验批判主义（即考察了理论本身——引者注）现在我们应当从它的历史发展上，从它与其他哲学派别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上来考察它。”（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九一页）

## 一、张横渠哲学体系的结构及性质

适应北宋中央集权的需要，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张横渠把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伦理观等等问题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思想体系总是思想家有意识地构成的，这一点张横渠当然也不例外。

1. 张横渠构造思想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紧紧地抓住了本体论问题和人性论问题。

剖析张横渠哲学体系，我们发现有两个问题是把握其哲学体系的关键，一为自然观上的本体论问题，一为伦理观中的人性论问题。张横渠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

关于本体论问题，他认为懂得“太和所谓道”，即懂得阴阳二气统一的本体，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衡量一个人有无“才智”，是否识《易经》、

是否懂得“圣道”的准绳。他说：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𬘡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不如此，虽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称也已。”（《正蒙·太和篇》）

这就是说，处于“太和”状态的气，即阴阳二气未分时的气，是产生万物的本源。这个本源“气”的自身之中，蕴涵着阴阳二气，具有阳浮阴沉，阳升阴降、阳动阴静的对立本性。由于这种浮沉、升降、动静的互相对立，互相感通，彼此的交互作用，便产生互相激荡，或胜或负，或屈或伸的运动变化，形成天地万物。他认为“语道者”谈论哲理的人，懂得“太和”之气为万物之本源，就算懂得了哲理；研究《易经》的人，懂得“太和”之气为万物之源，可以说是看懂了《易经》。如果不慬得这个理论，虽然有周公那样的美才，其智慧也是不值得称赞的。易经是当时学者奉为“圣经”用来立论的经典之一，周公是被历代学者捧为才智双全的圣人，而张横渠仅以识“太和所谓道”作为评论其是否具有才智的准绳，可知这一问题在他思想中所

占的地位。为什么懂得“太和所谓道”是衡量一个人有无才智的标准呢？他说：

“不悟一阴一阳，范围天地……遂使儒佛老庄混为一途。语天道性命者不网于恍惚梦幻，则是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①（《太和》）

即不了解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产生、构成天地万物这个理论，就会使儒、佛、老庄的观点混杂在一起。现在谈论天道性命的人，不是迷惑于把客观世界看成“恍惚梦幻”的佛教，就是以老庄“有生于无”的谬说，作为非常高深微妙的理论。求道入德的方法，不知道辨别选择，所以很多人被诐辞、片面之言所蒙蔽，被淫辞、放荡之言所陷入。因此，他认为懂得“太和所谓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是“语天道性命者”，即谈论哲理问题的人，不陷入迷途的关键，是“入德之途”，即求道方法正确与否的关键。

气的本体论是张横渠构造思想体系时的一个重

---

①以后出自《正蒙》一书引语，只注明篇名。

要问题。张横渠构造思想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关于“性”的学说。对这一点，张横渠也有过清楚的表述。他认为现在人们对人性论的论述，是谬论很多，漏洞百出，使人得不到一个要领，不知道遵循什么原则去行动，所以遇到事情，总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研究学问必须把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他说：“今之言性者，污漫无所执守，所以临事不精，学者先须立本。”<sup>①</sup>“明性”既是“立本”的重大问题，不是什么枝节之论，因此，他在构造自己思想体系时，强调地说：“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遗言以附会之。”（《语录》）明确指出，他要提出自己的人性论，不跟在别人后面去随声附和。

张横渠围绕上述两个问题来构造其思想体系，这一特点在《正蒙》的第一篇一开始，就清楚地表现出来：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太和》）

这段话，前一部分就是说的本体论问题，即宇

<sup>①</sup>引自《张子语录》，以后所引《张子语录》文句简称《语录》。

宇宙空间无形无状，是气存在的本来状态，气聚而成万物，万物散复归于气。气聚、散形成的具体事物，相对于永恒存在的气的本体来说，是气的“客形”、暂时存在的形态。这就从本体论上论述了本体和具体事物的关系。

这段话后一部分，就是说的人性论问题，人是由气化而来，所以人之性也来源于气之性，太虚之气的本性是人性的渊源。

张横渠思想体系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和阐述，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本体论和人性论旋转，也正因此，人们在批阅《正蒙》时，必然會发现“气”、“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或有关的概念充盈了篇幅。细读其著作之后，也一定能深深地体会到由于他对这两个问题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有的构思和规定，使多少传统的或当时思想家同时提出的命题和概念，富有了他特有的含义。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就连“天下之动，神鼓之也”这样传统的有神论命题，都有了另外的含义。

张横渠在构造思想体系时，紧紧地抓住了上述两个问题，当然是他有意识地作的，但是推动他的真正动力究竟是什么呢？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

“思想体系乃是由所谓思想家所作成的过程，虽然是有意识地作成的，但其意识是虚假的，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对他始终是莫名其妙的，否则这就不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九八页）

科学地剖析张横渠哲学思想体系，必须深刻地揭示这种动力之所在。

## 2. 张横渠紧紧地抓住本体论和人性论问题 有其深刻的原因。

下面，我们对这一点来作一些剖析。

首先就他提出“太和所谓道”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来说，我们主要探求两个问题，一为张横渠为什么抓住了本体论的问题，一为张横渠为什么采取唯物主义路线解决这个问题。

北宋的中央集权是以高级将领、官吏进行土地兼并为代价而取得的。因此，北宋时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就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来说，全国户口分为三种：（1）官户：享有“凡有科敷，例各减免”的特权，占有大量的土地。仁宗时，“天下田畴，

半为形势所占”（《宋会要食货》六三下）。官户以外，“有所谓税户，有所谓客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宋会要食货》十二）。（2）税户又称主户，它按土地占有多少，及赋税徭役不同，又分为五等，一、二、三等为上户，是占有土地较多的中心地主，它是地主阶级中不享有政治特权，人数众多的阶层；四、五等为下户，即自耕农民，赋税的主要负担者，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左右。（3）客户：“乃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田”（《石徂徕集》卷下），约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左右。主户中的下户加客户，共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但占土地只有百分之十几；主户中的上户加官户约占人口百分之十几，而土地却大约占到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因此，农民起义“一年多于一年，一火强似一火”，并且把斗争的锋芒，逐渐地指向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北宋初，王小波、李顺就高举了一面富有时代特色的旗帜：“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就统治阶级的情况来说，在宋代，统治阶级内部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自东汉发展起来，

到魏晋南北朝极盛了的门阀地主阶级，从隋开始，受到皇室的抑制，到唐代进一步衰落，特别是经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门阀地主阶级势力很小。唐，特别是北宋，主要是一般地主阶级。宋代，由于土地的兼并十分激烈，因此，地主阶级中升降较为频繁，由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对基本矛盾所制约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张横渠生活的当时，显得十分尖锐，再加以宋代面临辽夏的威胁，民族危机也十分严重。在外部矛盾的促使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中小地主阶层，一方面面临着被吞并、破产的威胁；另一方面又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对农民阶级的反抗，反映十分敏锐。因此，他们要求抑制兼并，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以缓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在这一阶层的代言人中酝酿着一种变法的思想，纷纷出现一些改革主张。如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的建议，并于一〇四三年实行“庆历新政”（参阅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见《范文正公全集》政府奏议卷上）。如李遵的富国、强兵、安民的改革主张等等。在局部地方，不断出现一些重要改革措施，如李参在陕

西的“审定其阙，令民自隐度麦粟之羸，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宋史》卷三三·李参传）。如李复圭的因“渐民以给衙前役多破产”，“悉罢遣归农，令出钱助长，召人承募，民便之”（《宋史》卷二五一·李复圭传）。又如钱公辅，“取酒场官卖收钱，视衙前轻重而偿以钱，悉免乡户，人皆便之。”（《长编》卷一九一）

总之，“变”已成为一种时代的思潮，“方庆历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龙川先生文集》卷十一）到神宗时，就演出了熙宁新法著名的一幕。但是，作为享有种种特权的大地主阶层，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他们希望维持现状，反对“变法”，这种反映地主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变”与“不变”的斗争，当时十分激烈。

一方面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强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另一方面，保守派断定“若使（王安石）为参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琬琰集删存》卷三）

一方面是变法派的针对“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的情况，要设青苗法，使兼并不得乘其急，要“衰

“多益寡而抑豪民”，立志要“见井地均”，反对“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催”（参见《王临川文集》卷四）；另一方面，则是保守派力言“贫富不均久矣。……非富民之多取也”（《范镇论青苗之害疏》），“惟州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栾城集·三集卷八》）

作为大地主阶层的代言人，适应他们维持现状的保守的政治主张，他们在哲学上宣扬人人安于天命的“天理”，采取唯心主义的路线。

而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的代言人，适应他们改良主义的政治实践的要求，他们不主张对事物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需要正视客观存在的事物，与此相连的在哲学路线上也与大地主阶层不同，他们有较多的可能采取唯物主义路线。这就是当时在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出现的现实的和阶级的原因。

为什么这时唯物主义恰恰从本体论的高度来批驳唯心主义呢？对于这一点，就只能从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来说明了。自魏晋开始，唯心主义，由于唯物主义的斗争和科学的发展，避开了粗糙的宗教形式，开始采取较为精致的哲学形式。有些唯心主义者，承认具体现象的存在，但认为物质现象之

外，之后，之上，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精神本体。具体的物质现象是有，是末，是用，而精神本体是无，是本，是体。精神本体的存在，决定着物质世界的存在。随后这种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与外来佛教宗教逐渐结合，愈演愈繁，其唯心主义的论述，更加精致，更加彻底。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占了绝对统治的地位。这种佛教宗教哲学自觉地、唯心主义地对待哲学的根本问题，如禅宗环绕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四照用”就是很好的说明。佛教把人们对自己认识能力的信任，称为“我执”，把人们坚持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称为“法执”。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接受佛教观点，主要是由于这两种“偏见”。它要大破“我执”、“法执”。“四照用”就是禅宗对参学者进行说教的四种方式，破“我执”、“法执”的四个原则，即把人们坚持“我执”、“法执”分为四种情况：一种是放弃我执，坚持法执，二种是放弃法执，坚持我执，三种是我、法二执全部放弃，四种是我法二执，全部坚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有的肯定这面，反对那一面，有的肯定那一面，反对这面，有的全部肯

定，有的全部反对，对坚持我、法二执的要进行严酷的思想斗争，要象“驱耕夫之牛，夺饥夫之食”那样，给予他们以致命的打击，要“敲骨取髓，痛下针锥”。佛教宗教哲学要大破“我执”，反对人们正常的认识途径。要大破“法执”，根本否认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宣扬“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宇宙万物都是心或意识的幻影，认定只有虚无寂静的“真如”本体，才是唯一绝对的真实。

对于从魏晋以来，唯心主义从本体论上对唯物主义的诘难，唯物主义未能作出针锋相对的回答，几百年间，虽曾出现过范缜、柳宗元、刘禹锡这些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范缜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的核心——“形灭神不灭”，柳宗元、刘禹锡虽然在揭露有神论认识论根源等方面作出了某些贡献，但未冲击当时的佛教哲学。

随着历史的推移，哲学两军对战的深化，唯物主义必然要逐步穷源到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立论的根基，并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这个根基。历史的辩证法和哲学本身发展固有的规律性，不管有无张横渠出现，必将有一天有人要担当起这一时代的任务。